

定窯筭記

項元汴藏樽式爐、王鏞藏瓦紋簋和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

謝明良

截至目前，經由考古發掘所獲得宋代陶瓷的數量極為龐大，其中包括少數伴出墓誌、可確知墓主身分地位墓葬出土的陶瓷，中國江蘇省鎮江市北宋熙寧四年（一〇七一）章岷墓所出定窯即為著名實例。相對於考古出土標本，所謂傳世作品當中可確認收藏經緯的宋瓷則極罕見，而所知者絕大多數卻又只能追索到乾隆皇帝的收藏。本文擬介紹的宋代定窯白瓷計三件，除了一件曾經乾隆皇帝度藏，其餘兩件分別是明代著名藏家項元汴（子京）、王鏞（仲和）的舊物，屬難得的案例。結合明代文獻記載，將可以實物觀照的方式進一步地理解明代人的定窯收藏情況。

明代晚期徽州等地文人賞玩骨董蔚為風尚，往往不惜重金爭相購藏，造成「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吳其貞《書畫記》卷二），骨董業界既活絡，士大夫之間

甚至有以古玩之有無來區別雅俗（《書畫記》卷二）。不僅如此，骨董藝品還可做為有價物件流通代償或典當，如畫家丁雲鵬父親丁瓚為安徽休寧的開業醫，某次行醫時因望見患者家中一

件官窯瓶，雙方合意之下選擇以官窯為酬金，後來因丁妻抱怨只好又拿去當舖典當（明·汪道昆，《太函集》〈丁海仙傳〉）。骨董種類多元，包括書畫和各類器物，當然也涵括玲瓏滿目的陶瓷



項元汴舊藏 定窯樽式爐 高1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定窯龍紋殘片 高7.2公分 河北省定窯址出土



圖四 南宋乾道6年 定窯樽式爐 高6.7公分 湖南省長沙王龍墓出土



圖五 白定樽式爐殘片 高3公分 杭州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水池遺址出土

窯鼎記》的摹倣古瓷名家周丹泉之事蹟，以往已有味岡義人、梁莊愛倫和蔡玫芬的考論（註一）；而圍繞於「有才無行」，但又「頗有真見」（明，張丑，《清河書畫舫》綠字號第十一〈倪瓚〉）骨董商王越石的交遊和靈活詐術亦見於蕭燕翼的簡要述評（註二）；至於明清之際古物藝術市場相關論述更是豐富，其中井上充幸的系列論文既提供了研究史必要論著，同時也成功地鋪陳了該時期藝術市場諸情事和社會氛圍（註三），筆者讀後受益良多。以下本文擬借由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兩件可確切追溯至明代原收藏者，即項元汴（子京，號墨林，一五二〇）

一五九二）藏〈定窯樽式爐〉，以及王鏞（仲和）藏〈定窯瓦紋簋〉，管窺明代晚期士大夫階層追逐定窯之一景，文末另介紹一件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

項元汴藏〈定窯樽式爐〉

臺灣故宮藏有六件清宮傳世的定窯樽式爐，係於圓筒形器身下方置三足，表飾六道或七道凸弦紋，口沿無釉，餘施滿釉，通高九至十二公分。學界有關此式三足器的定名並不一致，除了「樽式爐」之外，另有「弦紋三足熏爐」、「三足爐」、「壺式爐」等稱謂，由於其原型可能來自漢代的酒樽（註四），本文暫以樽式爐

稱呼之。從畫像石或出土資料可知，漢代酒樽內置柄勺，下方有名為承旋的圓形器座，是成組配套的實用盛酒器，但此一器式至遲在宋代已漸改變其原用途而成為薰爐的流行器式，北宋呂大臨（一〇四〇—一〇九二）著《考古圖》（卷十）載廬江李氏「三足香爐」（圖一），除器足較高之外器式近於樽式爐；浙江省紹興環翠塔地宮咸淳元年（一二六五）紀年石函內置的龍泉青瓷樽式爐內尚留存青灰亦可為一證。（註五）

臺灣故宮藏〈定窯樽式爐〉當中一件爐身，由上而下飾二、三、一計七道凸弦紋，高一二·二公分，口徑一七·五公分，原配有玉頂木蓋，蓋裡中心刻「甲」字，又刻陽文和陰文「墨林」印各一方，「項氏家藏」印一方，可知原係明代著名藏家項元汴的舊物。（圖二）依據項元汴之收藏鈐印而得知原係項氏收藏的流傳至今古書畫名品數量不少，但可確認是項氏家藏的傳世陶瓷則極少見到。儘管大英博物館藏一件青花雙耳小扁壺之原裝貯木匣刻有「宣磁寶月瓶」、



圖二 項元汴舊藏 定窯樽式爐 高1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就學界的研究而言，見於〈定窯鼎記〉的摹倣古瓷名家周丹泉之事蹟，以往已有味岡義人、梁莊愛倫和蔡玫芬的考論（註一）；而圍繞於「有才無行」，但又「頗有真見」（明，張丑，《清河書畫舫》綠字號第十一〈倪瓚〉）骨董商王越石的交遊和靈活詐術亦見於蕭燕翼的簡要述評（註二）；至於明清之際古物藝術市場相關論述更是豐富，其中井上充幸的系列論文既提供了研究史必要論著，同時也成功地鋪陳了該時期藝術市場諸情事和社會氛圍（註三），筆者讀後受益良多。以下本文擬借由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兩件可確切追溯至明代原收藏者，即項元汴（子京，號墨林，一五二〇）

器，舉凡宋元古瓷以至當朝永樂、宣德、成化製品，甚至同時代陶藝家的創作都成為藏家們獵求的對象。宋瓷當中以汝、官、哥或定窯最為時人所稱頌，而由姜紹書所記錄的一樁與定窯白瓷三足鼎有關的事件，則涉及到士大夫階層的古物追逐，狡獪的骨董商販穿梭其間兼及倣古名家軼聞（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定窯鼎記〉）。由於其情節迂迴，高潮迭起，生動地傳達出明清之際藝術市場的一個面向，試將其概要抄譯如下以為本文開場。

話說姜紹書撰〈定窯鼎記〉記錄的乃是毘陵唐太常（鶴徵，隆慶五年，一五七一年進士）收藏的一件舉世無雙的白定圓鼎，以及吳門周丹泉（時臣）借覽該鼎，以手度其分寸並摹鼎紋，半載之後倣製出與之纖毫無異的白瓷鼎。太常嘆服之餘以四十金購入以為副本，以後入淮安杜九如之手，旋為頗具眼力但素行不良的骨董商王越石（廷瑀）所得。王越石先以方鼎偽充太常圓鼎欺瞞泰興季因是得五百金，後又因一幅倪瓚山水糾紛與同鄉黃黃石（正賓）僕人佛元拉扯，不料造成定鼎墜地而毀，王越石因此以頭撞黃黃石以至宦途不遂本已鬱悶的黃氏越夕奄逝。為避風頭王越石漏夜潛往杭州，卻又再以一贗鼎以二千金誑騙路王朱常滂。及至清兵入杭，路王北行，承奉啟雲索性將鼎沉於錢塘江中。



圖一 《考古圖》載「三足香爐」



圖七 「周丹泉造」銘黃釉鼎 高16.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做蟠螭狀的三足鼎，其形制應較接近元明器式，故不排除是以假充真的做定贗品。

與臺灣故宮傳世項氏〈樽式爐〉爐式一致的定窯作品曾見於湖南省長沙南宋乾道六年（一一七〇）王諱墓（註八）（圖四），近年浙江省杭州南宋臨安城內亦見不少類似標本。

（圖五）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載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即項元汴去世後五十五年，「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無遺」，其孫項嘉謨率二子及妻妾投天



底部

星湖死（卷下，〈項墨林收藏〉）；宋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也目擊項氏聚集天下名物的天籟閣已是廢墟。（《曝書亭集》卷九）可以附帶一提的是，前引大衛德爵士認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項氏文物俱攜往北京（同前引文，頁二六），伯希和則傾向汪六水可能仍戍守南方或西南一帶。（同前引文，頁四五）另一方面，明代藏家之間常見藝術文物交換或買賣，轉手賺取差價亦屬當時氛圍，地方官亦常揣摩上意將經由不同管道獲致的古瓷上貢內廷，例如雍正



圖六 王鏞舊藏定窯瓦紋爐 高10.9公分、口徑13.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京」字銘（註六），但扁壺年代是否能上溯明代宣德朝仍有疑義，而一九〇八年由Bushell在英國牛津出版附有英譯文的項元汴藏瓷器圖譜，以及題為項元汴撰由民國郭葆昌和福開森（J. C. Ferguson）依據Bushell本校釋刊行的項氏歷代名瓷圖譜又屬偽書（註七），因此臺灣故宮藏〈定窯樽式



底部

爐〉無疑是少見且可靠的項元汴家藏傳世古瓷。另外，此式定窯樽式爐於當時的呼稱不明，惟成書於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之高濂《遵生八牋》提及「獸頭雲板腳桶爐」為定窯上品（《燕閒清賞箋》卷上）。就器形而言，今日俗稱的樽式爐、壺式爐或屬明人所謂「桶爐」類？

文獻記載項元汴對於宋瓷似乎情有獨鍾，特別是酷愛定窯鼎爐類製品。張岱（一五九七—一六七九）《陶庵夢憶》載：「葆生叔少從涇陽游，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匜，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仲叔古董》條），是為一例。汪何玉（一五八七—？）也記錄了〈定窯鼎記〉主角之一骨董商王越石於崇禎甲戌（一六三四）留宿他家時「出示白定小鼎」質瑩如玉，花紋粗細相壓，雲口蟬翅，蕉葉俱備，兩耳亦作盤螭，圓腹三足，爐頂用宋作白玉鴻鸞，烏木底」，王越石還告訴他「項子京一生賞鑑，以不得此物為恨。索價三千金，吾里有償之五百不肯售，真希世之寶也」（明，汪何玉，《珊瑚網》卷二十，〈崇禎甲戌重九日〉）。

從今日的資料看來，河北省定窯窯址（潤磁嶺B區）曾出土所謂「夔龍文香爐」殘片（圖三），其是於細回紋地上飾寬體夔龍，和前述王越石「花紋粗細相壓」的白定小鼎有著相近的裝飾趣味。至於王越石出示炫耀並讓項元汴因未能購得而引以為憾的雙耳

朝承安恭曾進獻〈定窯某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雍正朝，卷二）無論如何，今日已難得知項氏舊藏〈定窯樽式爐〉入藏清宮的經緯。不過，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御製〈詠官窯爐〉有「墨林齋裏物」句（原注：爐蓋內有項墨林父秘笈之印），則輾轉流入清宮的項氏家藏古瓷不只一件，有的早在乾隆五十年之前已經傳入。

王鏞藏〈定窯瓦紋簋〉

造型做自西周青銅簋的〈定窯白瓷瓦紋簋〉，口沿及圈足著地處無釉，其餘裡外施釉，釉色白中泛黃，積釉處可見魚子般細密氣泡，頸飾變形回紋，高足部位飾垂珮紋，器身兩側口腹之間置帶垂珮的獸耳（圖六），從圈足內一塊漏釉露胎處墨書「仲和珍玩」，下方並硃鈐「王鏞」朱文印，可知該〈瓦紋簋〉原是明末著名藏家王鏞的舊藏。簋通高一〇·五、口徑一三·五、足徑九·八公分，原配置玉頂木蓋（已破損）。從一九二〇年代《故宮物品點查報



圖十 《宣和博古圖》載「周處敦」



圖九 《宣和博古圖》載「周園」



圖十三 《宣和博古圖》載「周史張父敦蓋」



圖十一 《宣和博古圖》載「周師望敦」

窯白瓷「彝爐」，據此或可揣摩復原程季白，後歸王鏞收藏之「白定」的器式特徵。依照吳其貞所描述王越石藏「白定圓鼎爐」：「高五寸，口徑四寸，身上兩道夔龍是為粗花壓細花者，間有十二道孤龍，冲天耳，蔥桿足，白獸面含在足上，一身全完無

瑕，精好與程季白家彝爐無異，惟白色稍亞之。世無二出，越石兄弟叔姪共使一千二百緡購入，後來售予潞藩，得值加倍。又有一隻副本，色緋骨亦堅，迥然不符吳門周丹泉所贖者，時壬午五月二十二日」。吳其貞在程季白身亡（一六二六）後十多年

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的證詞頗為珍貴，但亦有若干難解之處。就該「白定圓鼎彝」的紋樣而言，器身兩道粗花壓細花的夔龍紋，可能是如前引定窯窯址所出於細密的回紋地上飾寬體夔龍的標本（同圖三），至於器身十二處龍紋或雙耳、蔥足之器式不免讓人連想及原型可能來自宋代青銅器畫樣或定窯的高麗青瓷三足鼎。北宋宣和五年（一一二二）徐兢奉命出使高麗，返國後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錄他此次見聞，圖經提到高麗翡色青瓷「復能作盤椽栳甌花瓶湯盞，皆竊倣定器制度」。（卷三十二《陶尊》條）此處高麗青瓷所欲模倣的定窯當然不會是定窯的白釉，而應是器形或紋樣，因此高麗青瓷的器式或亦可為復原定窯器型紋樣時的參考依據？如韓國中央博物館或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高麗青瓷（龍紋香爐）（圖八），乃是以弦紋將鼎身分為上下兩段，並以垂直出戟將各段間隔出六個區塊，上段部位各區塊均以細回紋為地，上飾兩只寬體夔龍，其六區塊內總計十二隻的夔龍，以及



圖八 高麗青瓷 夔龍紋鼎 高17公分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十二 耀州窯青瓷瓦椽椳 高17.4公分
陝西省藍田北宋呂大臨家族九號墓出土

告》（北京：線裝書店，二〇〇二）可知，該〈白瓷筭〉原收貯於壽安宮大木櫃中，當時定名〈定磁雙耳爐〉，一九三五年赴英國倫敦展出時更名爲〈南宋吉州窯牙白弦文敦〉（《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錄》瓷器篇，一九六三，圖九二）；一九六〇年代臺灣故宮爲皮藏陶瓷編目時稱〈南宋吉州窯牙白弦紋筭〉（《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上篇，一九六一，頁一六六），迄一九八〇年代特展圖錄更名爲〈定窯獸耳瓦紋筭〉，並將年代改定爲北宋期。（《定窯白瓷特展圖錄》一九八七，圖十八）

按王鏞字仲和，是明末清初著名書家王鐸（覺斯，一五九二—一六五二）二弟。王鏞篤好古物，所藏名品甚多，並且樂於與友人分享，「有借觀者，則盡出布於堂上，令人接應不暇」（明·吳其貞，《書畫記》卷三），其重金購進的西周「文王鼎」更是他得意之舉，也是時人樂道的軼聞（《韻石齋筆談》〈文王鼎〉）。傳西周時期的青銅文王鼎原物不存，但明代晚期所做「文王鼎爐」，獸面戟耳彝爐，不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真，其中又以《定窯鼎記》事件的主角之一周丹泉的早期做製品最爲逼真。（《遵生八牋》〈燕間清賞錄·論定窯〉）目前未見周做定窯製品傳世，但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則收藏一件清宮傳世〈黃釉獸面紋鼎〉，底陰刻「周丹泉造」雙行四字

楷書。（圖七）王鏞對於定窯鼎爐頗爲鍾愛也有所收藏。如徽商吳其貞提到他造訪金衢王鏞寓所，除了觀賞王氏收藏的漢代玉觥、青銅鼎、青銅甗等名品，還得見一件「白定彝」，後者乃得自嘉興姚氏，原是程季白舊物。（《書畫記》卷三）程季白（一六二六年卒）是著名的徽州藏家，與董其昌（玄宰）交好，曾從玄宰處得〈青卞隱居圖〉，並藏有王維〈江山雪霽圖〉等名作。吳履震勸戒時人不宜嗜古即是以定窯爐做爲警惕教材，董其昌和項元汴等名人也涉及其中，即：「吾鄉有覓古玩者，一日偶見一白定爐，須價六兩，謂一足少損，只以一金。後售顧亭林得四十金，復授董玄宰增至六十金，又轉授攜李項氏，益至二百五十金」，但最倒楣的是以重金購入的程季白，只因佞臣魏忠賢獲得情資後遣人求之卻未能如願，遂誣以謀反而至季白下獄身亡。（明·吳履震，《吾晉志逸》〈白定爐〉）（註九）



圖十五 定窯瓜式太白樽 高18.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癸巳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余佩瑾曾依據同一年度《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古玩檔〉所載「定磁天盤口紙槌瓶一件（隨紫檀座，底刻乾隆御題）」記事，

結合詩文內容可知，乾隆皇帝認為其為北宋末期定窯製品，也頗欣賞瓶子素樸無紋飾，並且還提到本文已出現多次的定窯做製名家周丹泉。

乾隆癸巳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余佩瑾曾依據同一年度《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古玩檔〉所載「定磁天盤口紙槌瓶一件（隨紫檀座，底刻乾隆御題）」記事，

手墜毀者，而高價售予潞王朱常淓者其實也非吳其貞所吹捧之「世無二出」舉世無雙的珍品，而是王越石委人所做的「贗鼎」。其次，吳履震《五茸志逸》載黃季白藏後入王鏞手的定窯鼎爐「一足少損」，而潞王購自王越石的贗鼎則是因王命廚役啓匣

取鼎，「忽折一足」，至廚役投水死。《韻石齋筆談》〈定窯鼎記〉、姜紹書和吳其貞所記述的定鼎到底是一是二？孰是孰非？時至今日，已無從評論。

乾隆皇帝的「定窯瓶子」

從乾隆御製詩集可以輕易得知

雙耳、葱管足之器式既吻合王越石藏「白定圓鼎爐」的器式，也可做為定窯窯址出土夔龍紋標本（同圖三）復原時的參考依據，而此一鼎式既和〈定窯鼎記〉唐太常藏或周丹泉所做製之帶蓋鼎爐不同，其紋樣裝飾也跟前引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周丹泉造」銘〈黃釉鼎〉（同圖七）有異。另外，北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載錄的「周圓腹饗餐鼎」（圖九，卷四之二十八）之造型和紋樣也和上述

高麗青瓷或〈定窯白瓷鼎爐〉頗為相近。不過，考慮到朝鮮半島早在高麗成宗二年（九八三）已自宋朝攜入「祭器圖」，至北宋政和七年（一一一七）更收受徽宗所頒賜的新成禮器，看來定窯和高麗青瓷鼎爐更有可能是以《宣和博古圖》等圖籍所載錄器物依樣摹製的。就此而言，王鏞瓦紋簋（同圖六）之器式近於《博古圖》「周處敦」（圖十，卷十七）或「周師望敦」（圖十一，卷十七）

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而近年陝西藍田北宋呂大臨家族九號墓出土的耀州窯青瓷瓦稜簋（圖十二）也可在此一脈絡中予以掌握。後者之器蓋既酷似《宣和博古圖》「周史張父敦蓋」（圖十三，卷十七），並可據此想像王鏞瓦紋簋蓋的原型。

另一方面，姜紹書《定窯鼎記》談到王越石其實擁有多件真贗定鼎，其中一件方形贗鼎售予泰興季因是，另一件乃前述黃黃石（正賓）僕人失



圖十四-a 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 高15.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b 同上 底部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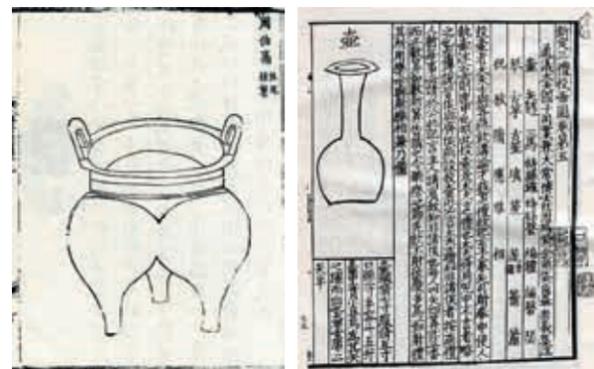
1. 味岡義人，〈周丹泉—明末景德鎮窯の一民匠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39輯，1978，頁54-63；Ellen Johnston Laing, "Chou Tan-ch'uan is Chou Shih-ch'en, A Report on a Ming Dynasty Potter Painter and Entrepreneur," *Oriental Art* (Autumn 1975), pp. 224-229；蔡汝芬，〈蘇州工藝家周丹泉及其時代〉，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269-290。
2. 蕭燕翼，〈明清之際的骨董商王越石〉，《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頁41-45。
3. 井上充幸，〈明末の文人李日華の趣味生活—『味水軒日記』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59卷第1號，2000，頁1-28；井上充幸，〈徽州商人と明末清初の藝術市場—吳其貞『書畫記』を中心に〉，《史林》第87卷第4號，2004，頁34-65；井上充幸，〈姜紹書と王越石—『韻石齋筆談』に見る明末清初の藝術市場と徽州商人の活動—〉，《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4號，2006，頁1-37。
4. 孫機，〈釋「清白各異樽」〉，收入同氏《文物叢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74-79。
5. 浙江省博物館（朱伯謙），〈浙江兩處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年4期，頁3圖2，彩圖見：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214。
6. Percival David, "Hsiang and His Album,"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 Society* (1933-1934), pp. 27-28; PL. XI, fig. 3, 4.
7. Bushell, S. W., *Chinese Porcelain; Sixteenth Century Coloured illustrations with chinese text by Hsiang Yüan P'ien* (Oxford, 1908)；郭葆昌等，〈項元汭歷代名瓷圖譜〉，北京：辭齋書社，1931。所謂項氏陶瓷圖譜為偽書一事參見：伯希和（馮承鈞譯），〈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中國學報》第2卷第2期，1944，頁38-54。
8. 高至喜，〈長沙東郊楊家山發現南宋墓〉，《考古》1961年第3期，頁148-150轉159。原報告書中並未記明出土白瓷窯器，也未刊載圖版，本文係依據馮先銘《定窯》中國陶瓷全集九（京都：美乃美、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頁183確認，彩版參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3·湖北·湖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212。其次，該墓墓主王蒨，於原報告書中只記為□蒨，筆者是依據作銘，〈長沙東郊楊家山南宋墓墓主考〉，《考古》1961年第4期，頁227轉229一文確認。
9. 載錄於《書畫記》的程季白藏「白定彝」和《五茸志逸》的「白定爐」後歸王鏞所藏一事，已由井上充幸所指出，參見前引〈姜紹書と王越石—「韻石齋筆談」に

見る明末清初の藝術市場と徽州商人の活動〉，頁31，註26。

10. 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56對圖4的解說。
11. 謝明良，〈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8，頁3-15。

圖版出處

- 圖1 (宋) 呂大臨，《考古圖》卷10(四庫本)之18。
- 圖2 《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圖17；《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II-6。
- 圖3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神奈川縣：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2013，頁142圖6；秦大樹等，〈定窯潤磁嶺窯區發展階段初探〉，《考古》2014年3期，頁91圖18。
- 圖4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3·湖北·湖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212。
- 圖5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154彩版56之1。
- 圖6 前引《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圖18；《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11。
- 圖7 《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III-36。
- 圖8 林屋晴三編，《安宅 コレクション東洋陶磁名品圖錄》高麗編，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0，圖132。
- 圖9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史部：四庫本《重修宣和博古圖》卷4之28。
- 圖10 前引《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7之25。
- 圖11 前引《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7之15。
- 圖12 林侃等編，《異世同調—陝西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5。
- 圖13 前引《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7之29。
- 圖14 前引《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圖19；《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11；《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56-57圖4。
- 圖15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定窯·定窯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8；前引《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圖1-12。
- 圖16 (宋) 晁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收入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75。
- 圖17 胡雲法氏藏
- 圖18 前引《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9之11。



圖十八 《宣和博古圖》載「周伯高」 圖十六 《新定三禮圖》中的「投壺」



圖十七 定窯鼎爐 傳臨安皇城遺址出土

指出此即前引故宮藏定窯長頸瓶。(註十) 本文同意這個看法，所以詩題的這件「定窯瓶子」也就是活計檔中的「定磁天盤口紙槌瓶」。

儘管目前仍乏資料得以將該盤口紙槌瓶定訂準確的年代，但從盤口沿璇削形成盤壁之高起邊稜準確而俐落，口頸部位線條端正明快等作工看來頗有北宋氣韻，這從其盤口造型和清宮傳世另一件具北宋器式特徵之〈定窯瓜式太白樽盤〉口基本一致(圖十五)，亦可得出相同的年代推

論。眾所周知，器身腹造型各異但同屬盤口長頸紙槌器式的陶瓷製品是宋金時期流行的器形之一，河南省清涼寺汝窯、張公巷窯，浙江省南宋官窯、龍泉窯甚至朝鮮半島高麗青瓷亦可見到，而其原型則來自當時亦曾輸入中國的伊蘭玻璃瓶。(註十一) 問題是上述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果真亦如盤口紙槌瓶般原型乃是來自伊蘭玻璃瓶，抑或有其他淵源？

本文在此擬予提示的是，宋代祭器的質材多元，包括銅、玉、漆、

陶、木等，其器式樣本不僅會參考前述北宋《宣和博古圖》所載錄的器物，也依據晁崇義於北宋建隆三年(九六二)進呈太祖的《新定三禮圖》製備祭器，而《三禮圖》所圖繪做爲士大夫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儀的「投壺」(圖十六)之基本器式正和「定窯瓶子」相近。當然，此一情事或許只是巧合，但我們亦需留意流傳於市肆傳臨安皇城遺跡出土的宋金時期定窯白瓷三足鼎爐(圖十七)之造型特徵亦頗近於《宣和博古圖》中的罍。(圖十八)乾隆御詩讚美「定窯瓶子」是「不琢花紋敦素後」，此與素樸無紋的定窯鼎爐風格一致，然而卻和其他同一檔次定瓷一般均施加各種刻印紋樣大異其趣。《漢書》提到祭祀用陶器「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郊祀志》卷下)這會不會就是以上兩件釉色精純、造型端正定窯作品不加飾紋樣的原因？但也可能只是對於宋代禮書所載錄器物的忠實模倣。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